

外商投资迎来“调结构”时代

□ 苑生龙

经历多年高速增长后,外资进入中国已由大幅扩张逐步进入到存量趋稳、结构升级的新阶段,我们不必担心所谓“撤资潮”,但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外资政策,优化引资与用资环境,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科技领域,尤其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给出的重点发展领域,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良好作用。

工车间进行转移。此外,也有部分服务业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市场,如Tesco、百思买等,但这类企业的退出案例较常年并未明显增加。各方信息均显示,外企撤离集中出现于制造领域,与中国本土产业梯度转移进程基本契合,体现了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总体趋势。

最后,外向中高端领域投入加大。近年来,伴随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趋势,外商投资开始向高技术领域集中,高科技制造业及高技术服务业引资步伐均有所加快。高科技制造业中,2016年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利用外资增长95%,医药制造业增长55.8%。高技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955.6亿元,较上年增长86.1%。此外,近年来国际高科技领域的著名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力度逐步加大。在高级制造领域,大众、克莱斯勒、罗氏、空气化工、博世、亚马逊等知名企业纷纷加大对华投资,富士康、宏达等加工贸易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继续扩大投资。在机器人等新兴高科技领域,瑞士ABB、德国库卡、安川电机和日本发那科等国际机器人巨头都在中国设立分公司及合资公司,不断强化布局优势。

中国制造的崛起,使部分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挤出

经历多年高速增长后,我国对外资的利用已进入全面调整阶段,这是外资流向结构发生改变的重要背景原因。

首先,我国已进入投资发展新阶段。多种迹象表明,在双向直接投资,特别是利用外资经历多年高速增长后(92年以来年均10%),我国已进入投资发展的新阶段。2015年起,已连续两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实际利用外资,实现国际收支金融账户下的长期资本净流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一国由净受资国转变为净投资国,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直接资本的进入将由单向存、流量扩张进入到存量趋稳、结构升级的新阶段,而部分存量外资的撤离及转移即是常见的具体表现之一。因而,站在投资发展



飞地经济如何顺利腾飞

□ 麻宝斌

是目前我国“飞地经济”合作中面临的一个突出困境。

“经济飞地”管理机构的权能定位不清晰。在“飞地经济”的合作中,“飞入地”之所以将“经济飞地”部分或全部的经济事务管辖与开发权让渡给“飞出地”,主要是要通过“飞出地”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加快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飞地”管理机构承载了过多与经济事务管理不相关的社会管理职能,就可能影响从事经济事务管理与开发的时间和精力,也就会影响经济合作的顺利实施。此外,“经济飞地”管理机构与“飞入地”以及“飞出地”政府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更为清晰的定位。

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特征不明显。尽管“飞地经济”突破了“行政区划”的局限,但在诸多方面仍摆脱不了原有行政体制的束缚。地方政府的过多介入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一是在地方政府进行合作与协商的过程中,往往会要求相互之间行政级别的对等,否则合作很难进行;二是这种合作往往会由于地方政府负责人的变化而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三是这种合作往往不能突破省级行政区划,实现跨省的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合作双方之间缺乏较为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动因看,目前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主要是依靠利益驱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之间合作的主导动因。但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合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在权责划分以及收益分成等问题上大多是一事一议,没有固定的分配机制。所以地方合作也常常因为在合作收益分配问题上发生争执而中断。这主要是由于税收与GDP统计中属地原则的影响导致的。

的长周期视角下,受总体市场环境及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的推动,我国对外资的利用已进入全面调整阶段,这是近年我国部分领域外资撤离有所增加,外资流向结构发生改变的重要背景原因。

其次,企业经营的要素成本上升。这是部分外资撤离我国的直接原因,主要包括:第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平均人力资本从2006年开始持续上升。中国社科院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已大幅超过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用工成本增加,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最为明显,使我国传统外向型制造业在吸引外资方面比较优势被削弱。第二,土地成本快速攀升。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以及部分短期因素的影响,我国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同时,我国自2007年起已将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纳入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使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的土地成本持续加大。第三,环境成本负担加重。近年来,我国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针对企业生产造成的污染排放管控措施日趋严格。同时,我国对环境的监管力度也进一步强化。在这一背景下,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环境成本负担日益加重,这一领域的直接资本撤离已成为必然趋势。

再次,本土企业实力提升。经过多年积累,我国本土企业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已逐步走向成熟,技术、资本及管理层面面的水准均有明显提高,部分本土品牌开始在国际领域崭露头角。伴随外资企业在多层面的比较优势的逐渐弱化,其与本土企业正加快形成竞争格局。考虑企业总体实力逐步提升的阶段性,非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内外资竞争将首先加剧。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目前内外资企业已几无技术差别,而本土企业对市场把握更加贴切和精准,更加善于降低各种成本,具有天然优势,因而逐步占领市场份额,使部分外企在竞争中挤出。可以预见,未来内外资企业的竞争加剧态势将进一步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领域扩张,外企在华生产经营面临的竞争压力继续增加,外国资本在华生产经营

的盈利预期被压低,也成为当前部分外资撤出中国市场因素之一。

最后,政策因素的推动。一是国外政策的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美、日、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提出新一轮工业发展计划,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和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日本工业复兴计划等,均有意借此弥补传统国际分工模式造成的本土产业空心化,提升本国工业制造水平及促进国内就业。发达国家的政策方向调整,为部分企业的海外生产链条回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及市场条件。而东南亚地区国家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积极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二是国内政策的调整。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将外资纳入正常监管范围,促进内外资公平竞争,是我国外资管理的必然趋势。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施行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原来执行的再投资退税、特许权使用费免税和定期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被取消,外企税收从15%提升到25%。近年部分地区对外资进入的管理更趋严格规范,对部分外企在国内的经营战略有所冲击。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外商投资迎来“调结构”时代,对此我们应针对性加强疏导,减少并规避短期风险,力促其积极意义的发挥,使这一调整进程的进展能够平稳而有序。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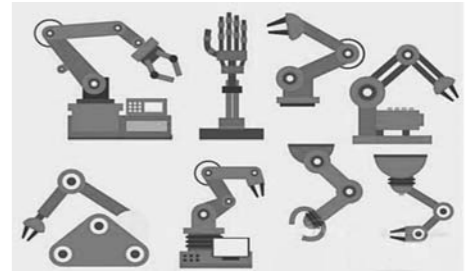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积极引导外资调整,使外资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机器人产业:走出低端怪圈

□ 陈明鹤

在机器人产业领域,我国应用市场广阔但缺乏核心技术,对此可借鉴高铁的发展思路:以市场发展壮大企业,以应用实现经济效益,以实践为技术再改进、再创新的压力和动力,由此实现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追赶和超越。

9月27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发表了一番“捧杀”言论,声称“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机器人发展的速度都要快”。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确实有了长足发展,但同时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发展迅速的是机器人的应用领域,而在研发、生产环节,我国所需要的高端设备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没有掌握,在与机器人跨国公司的竞争中依旧有较大差距。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我国机器人产业向高端化发展?

首先,机器人产业发展缺乏顶层设计。从2014年至今,建设机器人产业园区的热潮已经遍及全国。一些地方政府为追逐经济增长,不考虑现实条件盲目进行项目建设,抢占机器人市场。由于政府具有超强的行政能力,可在短期内聚集各种资源,所以一旦方向错误将造成严重的高耗能、低效率,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很有可能错过了发展真正优势产业的良机。同时,还可能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扰乱市场秩序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集中在低端领域。机器人产业应是高端制造业,但我国机器人产业仍然没有摆脱只能参与到低端产业的低端领域进行生产的怪圈。2016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全国机器人产业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初步统计涉及机器人生产及集成应用的企业有800余家,其中200多家是机器人本体制造企业,大部分企业以组装和代工为主,产品主要集中在三轴、四轴的中低端机器人。企业规模也普遍较小,逾90%的企业年产值在1亿元人民币以下,龙头企业规模也不大,同国际机器人领先企业的营业收入相比差距较大,难以支撑产业未来规模化发展的目标。中国本土企业高端品牌机器人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本土市场高端机器人的外国品牌占到85%。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在机器人的三大核心零部件——伺服系统、减速器、控制器的研发上始终受制于人。

最后,企业间简单模仿引发恶性竞争。中国有800多家机器人企业,但真正具备领先技术的企业并不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能够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也仅有少数几个老牌企业。如此众多缺乏高新技术支持的机器人企业的运营方式,严重影响了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中国机器人行业竞争也没有摆脱内部简单模仿引发恶性竞争的问题。这样的恶性竞争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机器人产业危害极大,因为机器人产业是“三高”——技术、人才和资本密集度高,简单模仿低价竞争直接损害了技术研发企业的利益,阻碍了领先企业通过获得稳定的资金投入形成研发、生产、销售的正向循环,直接影响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而且在功能、性能上对高新技术机器人的简单模仿,不仅会降低用户期望,甚至可能导致业内人士对中国机器人行业的差评,影响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

机器人产业作为我国参与新一轮世界经济竞争的核心产业,未来发展要以多样化、专业化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机器人产业各相关主体应各司其职,机器人企业以创新参与竞争,政府以政策支持,设置科学的顶层设计与战略架构。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应为提升该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以顶层设计带动产业发展。在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是提供政策支持,进行顶层设计与战略架构,与市场相配合共同促进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以培育有国际级竞争力的企业为发展目标,选择真正有创新能力的少数企业进行重点培育。由工信部等主管部门制订我国机器人发展总体规划,统一部署集中资源,避免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保证规划执行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发挥好规划的引导作用。

开发以创新性、独特性和差异性为目标的产品。首先,机器人产业必须要具备创新性。机器人分为两种,工业机器人和非工业机器人。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正在努力追赶,而在非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有着更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非工业用的服务机器人和智能机器人领域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服务机器人未来市场巨大,为中国提供了更多参与竞争的机会。其次,中国机器人产业要具备独特性和差异性,避免低端重复。在工业机器人产品的研发上,中国机器人产业要高低并行。在低端工业机器人市场中,以适量的企业重新分配已经占据的市场份额;选择有能力的企业重点攻克高端工业机器人领域,解决制约中国机器人发展的核心技术问题。在服务机器人和智能机器人研发领域,结合企业优势进行不同项目的研发。

以本土市场培育本土企业。中国机器人是世界机器人企业的必争之地,作为本土企业,中国机器人制造企业熟知市场需求,有着先天的优势,可以借鉴中国高铁的发展思路,以本土市场强本土机器人企业。我国高铁在技术引进之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较高的铁路装备的工业生产、研发技能,所以在技术引进后,有能力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下一阶段只需把经过再创新的技术应用于中国市场,根据中国高铁铁路特点进行改进,以市场发展壮大企业,以应用实现经济效益,以实践为技术再改进、再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中国高铁的发展,证明了我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市场进行产品的整合、升级,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参与世界竞争。我国机器人企业也可以如此: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国本土企业发展以满足中国市场的巨大、多样性需求;另一方面以中国市场来促进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培育国际性的企业,参与世界机器人产业链竞争。以此,形成中国机器人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以市场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持力,帮助中国机器人企业实现追赶和超越。

(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